



1930年12月2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前的紧张时刻，红军在江西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台柱上，挂着毛泽东为大会写的一副工整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联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通俗易懂又蕴含深意，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大家念了又念，打破“围剿”的信心更足了。

### 积极防御是我军一贯坚持的总方针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也是我军始终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根据红军的作战实际，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包含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又包含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成为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发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大大丰富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在大规模战争中熟练地将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反攻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了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实践，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防御上升为国家军事战略。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提出，

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认为我军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并经中央批准后，积极防御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之后，根据不同时期具体形势任务的不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作了多次充实调整。20世纪60至70年代，先后采取“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980年重新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1988年提出要稳定北线、加强南线、强边固防、经略海洋；1993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2004年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军事战略问题，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同时进一步丰富发展其时代内涵，以防御为根本，在“积极”二字上做文章。2014年，习近平主席领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以海上方向军事斗争为战略重心。今年以来，军委多次强调，全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 上甘岭战役：将敌人打回谈判桌前

□ 吕少德 张世贵

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停战谈判已进行一年有余，美国为增加谈判筹码，企图在战场对我发动新的攻势，妄想以战场上的胜利迫使我同意其在谈判中的无理要求。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并叫嚣：“让大炮和炸弹和你们辩论吧！”14日，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对我15军45师驻防的五圣山前沿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动突然进攻，展开了所谓“金化攻势”。五圣山位于三八线以北约30公里，是朝鲜中部的绝对制高点，如果失守，我方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背后有一个村庄叫上甘岭，因此我方称这场战役为“上甘岭战役”。

指挥“联合国军”的主将范弗里特原计划在5天之内、以200人伤亡的代价拿下这两个高地，但是经过43天惨烈的战斗，“联合国军”投入60000余兵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付出2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仍然寸土未得。上甘岭战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士气，此后，敌再未发动营以上攻势。这一战，打出了我国威军威，奠定了朝鲜南北疆界，将敌人打回到谈判桌前，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

“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坑道技术。10月14日凌晨，敌出动300多门火炮、27辆坦克，以每秒6发的火力密度对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进行火力准备，随后，以7个营的兵力发动猛攻。然而，敌未料到在经过持续一小时的密集炮火轰炸之后，仍有大量志愿军“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对进犯之敌迎头痛击。当日，敌对我两个阵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发射炮弹500余枚，我表面工事全被摧毁，半数表面阵地失守，我军退守坑道。当日晚间，我军依托坑道组织反击，将阵地悉数夺回。此后7天，我军以寡敌众，在敌优势火力下，与敌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歼敌7000余人，顶住了敌军的疯狂进攻。

在如此激烈的敌军炮火打击下能取得这样的战果，与我军灵活运用坑道战术密不可分。在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

“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按照上级部署，我军在上甘岭阵地反斜面（即敌进攻山体的背面）构筑起“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的坑道体系。每条坑道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洞内宽1.2米、高1.7米、顶厚30米以上。这种建在反斜面的坚固的坑道工事，充分利用各种火炮的射击死角和山体作掩护，有效削弱了敌炮火优势，使我有生力量在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能得以最大限度保存。因此，当敌炮火延伸、步兵冲锋时，我坑道部队即可迅速冲出，发挥我军近战优势，与敌步兵展开搏斗。

10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敌军占领我大部分表面阵地，我军由于伤亡过重，无力反击，遂退守坑道，由此，战役进入坑道作战阶段。此后，我坑道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冷枪冷炮运动，从坑道内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修筑的工事，“零敲碎打收拾敌人”，以较少的代价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敌人日夜惶恐不安，无法稳固占领表面阵地。仅在坑道作战前十天里，各坑道就组织小股部队主动出击158次、歼敌2000余人，将敌人拖在坑道上方的表面阵地无法前进一步，为我后方部队准备大反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在上甘岭战役中，我炮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我方火力较弱、步兵冲击路程较远等劣势，志愿军在常规步兵协同战术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使我炮火威力倍增，对敌造成有效杀伤。

在战役前7天的拉锯战中，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防守时炮兵组成多道火力阻拦线协助步兵袭击集结、冲击、增援之敌，反击时步兵紧跟炮兵弹幕前进，猛烈的炮火支援有效杀伤敌有生力量，摧毁敌步兵工事和炮兵阵地，有力配合了我军防守与反击。

在坑道作战阶段，我炮兵各部分工负责保障各坑道口的安全，随时响应步兵呼叫给予火力支援，破坏封锁我坑道口的敌据点工事，掩护我小股部队出击歼敌，集中射击表面阵地上的敌军，“以准确而猛烈

的炮火支援，有效地保护了坑道口的安全，给了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以大量杀伤，对取得坑道作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月30日22时，我军集中各炮群以排山倒海之势展开大反击，开始了我志愿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炮战。5分钟炮火急袭后，炮火延伸，我步兵佯攻，此时敌军从残破的工事中爬出，抢修工事，展开队形，等待我步兵冲击。然而我步兵并未冲击，炮火却杀了个回马枪，对已经展开的敌军再次进行了10分钟炮火急袭。如此反复数次，直接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摧毁敌工事70%以上，为我步兵冲击扫清了障碍，使步兵得以较为顺利地夺回阵地。此后的反击和巩固战斗中，我炮兵以灵活的战术和强大的火力配合步兵作战，“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到11月25日，我已恢复所有阵地，而敌再无力发动进攻，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战役中，我炮兵投入轻重火炮总计500多门，发射炮弹40多万发，炮火毙伤敌军12800余人，对战役胜利起到重要作用。第15军军长秦基伟总结战役时说：“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

“坚信我们一定胜利”的战斗精神。我军在敌火力、兵力、后勤等全方位绝对优势的碾压下，在区区3.8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激战43天，寸土未失。背后支撑我军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正是那无与伦比的战斗精神。

在战斗中，我志愿军官兵从上到下都充满着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45师师长崔建功说：“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43天的激战中，我军涌现出无数令人震撼的战斗英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身负七处重伤、左腿被炸断的情况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用血肉之躯堵住敌人射击孔，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孤身一人击退敌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自身却毫发无伤；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在被炸断双腿的情况下，用机枪消灭敌军80余人，弹药

###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积极防御的内涵和实质。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其基本内涵是指在敌人向我进攻后，我先诱敌深入退让一步，或坚守某些要点，努力创造有利于我而不利於敌的条件和态势，并发挥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以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争取局部主动和胜利，逐步地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改变战略被动态势，而后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直至在有利条件下实行战略决战，夺取战争最后胜利。其实质，是在时间、空间、层次等维度上将防御与进攻结合起来，在天然具有被动性的战略防御过程中，积极实行带有主动性的进攻作战。

与积极防御相对的，是消极防御。毛泽东指出：“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消极防御单纯为了防御而防御，其消极性在于它抛弃了积极防御中所包含的积极主动的进攻内容，表现为纯粹的被动挨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者在初期“御敌于国门之外”失败后，采用以碉堡对

碉堡、节节分兵抵御的消极防御方针，与敌军硬拼消耗，最终失败被迫长征。前线带兵的彭德怀评价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 积极防御的内核是坚持自卫立场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本质是防御性的。这首先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我们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去侵略其他国家，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只能是防御性的。其次是由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直面对着艰巨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一个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国家建设的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有效制止外国对我们的侵略，同时决不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只能采取防御性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是由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将防御和进攻作为区分国家间战争性质的根本标准，认为防御性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攻性的战争带有侵略性因而是非正义的。我们进行正义战争，军事战略方针决不应是进攻性而只能是防御性的。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防御性本质，要求我们紧守自卫立场。一是决不去侵略别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我

们，自己也决不去侵略别人，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防御性的集中体现。二是坚持后发制人。坚持自卫立场，就要后发制人，就不能打第一枪。当然，这个“第一枪”是政治意义上的第一枪，不能拘泥于军事上的含义。如果敌人率先侵害了我们的核心利益，把我们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就是对我们打了“第一枪”。我们出于自卫目的就可以反击，就可以用攻势行动来达成防御目的以消除敌人对我们的侵害。

### 丰富积极防御的实现形式

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根据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我军扬长避短的实现形式，使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得以具体化，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战略退却。这“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就是诱敌深入，需要早做准备，加强对干部群众的说服工作。

战略反攻。这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它具有双重特性，既是战略防御阶段的行动，也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

略进攻的必要前提。

战略决战。这是指挥难度最大的环节，也是决定两军胜负的环节。毛泽东一贯主张慎重初战，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千方百计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则指示避开敌人锋芒，积极防御逐步转变力量对比。直到1948年秋，决战时机才基本成熟，毛泽东抓住机会作出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策，组织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而基本上了解放战争的胜负问题。

战略追击。这是战略进攻的继续，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地理条件，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如解放战争后期，对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毛泽东提出了采取远距离大包围大迂回，断敌退路，再回打的作战方式；对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等敌，则采取了穷追猛打以小迂回包围的作战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战略追击思想，提出“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提出“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突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军在战略追击中的重要作用。



## 如何要把『落到实处』的

□ 周欣

以雷厉风行、敢于负责的斗争精神坚决纠治；对历史遗留的“糟心事”，以“新官理旧账”的胸怀品格主动出击、全力破解，真正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已做官。

坚持求真务实抓落实。军事竞争硬碰硬，要求军队各项工作必须实打实，来不得半点空对空，绝不能让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我军滋生蔓延。对表演作秀、文牍主义、“重痕轻效”、“贩卖问题”等“众生相”来一个大曝光，使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贯彻中央“基层减负年”要求，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确保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备战打仗息息相关的事上来。坚持以上率下，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体力行唯真求实，用亲知深知真知确保决策科学和落实质量。大力推进依法治军，强化法规制度刚性约束，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坚决打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大敌顽敌，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